



梁大均：追求进步 向往革命



梁大均。(资料图片)

梁大均(1914年至1999年)，曾用名梁光富、梁幼青、梁志城，宁夏青铜峡县叶盛堡人。1914年4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满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1930年下半年，宁夏中学由于校长徐宗孺袒护落后学生，发放学生津贴不公，引起了师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但不解决，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张韶龄等人以“违反校规”“犯上作乱”的罪名挂牌开除。梁大均、杨生连等进步师生不服，气愤地把牌子砸了。

此事引起了学校进步学生与落后势力之间的辩论，继而发展为斗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杜润滋抓住时机，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形成了全校公开罢课，引起学潮。学潮使国民党宁夏

当局非常震惊，便派警察对学生进行镇压，13名学生被抓捕。当时梁大均机警地从学校后墙跳出逃脱。

为营救被捕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潮越闹越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宁夏当局迫于压力，罢免了徐宗孺的校长职务，任命杜立亭为宁夏中学校长，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梁大均被开除学籍，受地下党组织派遣，随马仲英部队开往甘肃甘州。

1931年春，马仲英部同马步芳为争夺河西走廊在酒泉失利，去了新疆。梁大均从酒泉回到家乡，与随后回到宁夏的李天才以师生关系探监，与狱中的杜润滋联系，商讨组织革命武装。

在杜润滋的指示下，梁大均、李天才等人联络了原宁夏中学闹过学潮的部分同学，秘密成立“宁夏救国军总指挥部”，后改为“抗日西北救国军”。

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重点在省城、平罗、金积、宁安等地开展兵运工作，伺机进行兵暴。12月23日兵暴提前在中宁爆发，因组织不严密，缺乏斗争经验，内线人员错记约定日期而告失败，李天才等人被捕。省城南门兵暴也被敌人发现，梁大均辗转到了甘肃环县、平凉、靖远等地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梁大均先来到甘肃环县朱榜科处，在杜斌丞的帮助下，与朱榜科、赵子元成立了“甘肃环县游击大队”，朱榜科任司令，赵子元(共产党员)任副司令，梁大均任参谋长。后因游击队内有人叛变，偷袭本部，游击队未能坚持下去，梁大均遂又去了靖远、兰州等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

1938年2月，梁大均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何广宽带领下，进入边区，到延安抗大学习。8月，任八路军总部联络部派往傅作义部工作组党支部书记、游击军政治部建科科长、绥远抗日自卫军总部政治特派员等职。1939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历任陕北公学总务科长、经建科长，延安民族学院总务

处长等职。

1942年以后，梁大均历任中共宁夏工委委员、副书记。1947年1月，任回汉支队政委后兼中共甜水堡中心区委书记，与刘思孝、金三寿、何广宽等同志一道，领导回汉支队转战三边地区，有力打击了地主清乡团反动武装，在宁夏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梁大均先后担任中共宁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委员、宁夏省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共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梁大均被打入“孙、陈、梁、曹右派反党集团”，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受到迫害，被停止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给梁大均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历任甘肃省水电局局长、党组书记、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甘肃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9年6月26日，梁大均因病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享年86岁。

(据银川党史网)



孙殿才、梁大均、金三寿等人同解放军从永宁过黄河前往银川。(资料图片)

石嘴山回汉群众自发欢迎人民军队迎接解放

1949年9月23日，宁夏首府银川宣告解放。26日，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各族各界群众，欢天喜地涌向街头，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这个时期，尽管马家军(马鸿逵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但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地方土匪仍然到处扰乱破坏，为建立新生人民政权制造障碍。为了清剿残敌，迅速解放宁夏全境，十九兵团解放银川后，一部分部队继续挥师北进，以解放石嘴山各县，收缴敌人的武器弹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饱受马鸿逵反动统治的石嘴山回汉人民，也日夜盼望着解放军早日到来，在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前后，石嘴山各县一些进步人士为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自发组织起了一支迎接解放军的队伍，为解放军顺利接管政权奠定了基础。

9月22日，平罗县民主人士冒良辰等人听说解放军已经到了吴忠，都迫切希望早日把解放军迎进平罗城。经过商议，大家推举冒良辰和县参议会议长阎廷栋前往银川，反映大家的意愿。24日，两人到银川后，见到了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汇报了平罗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局势，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盼望解放军早日解放平罗。杨司令要求他们先回去一定要守好城，做好宣传，军队很快就去。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宁夏工委书记孙殿才。孙殿才指出：“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经商的好经商，做工的做好工。”于是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骑自行车赶回平罗县城。26日，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〇师五六九团，在团长罗保顺率领下进驻平罗县城。随后派一个连的兵力，由一营李营长带领直奔惠农县城。

部队到惠农县城后，在城南门布置警戒岗，向土匪做政治宣传令其进城缴械。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威慑下，数十名匪徒只得缴械投降，从而使惠农县城避免了匪徒骚扰，并得以和平解放。紧接着惠农县举行了约有二三百人参加的欢迎仪式，场面十分热烈。李营长在欢迎仪式上讲了话，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解放战争，最后讲道：“西北解放了!宁夏解放了!惠农解放了!”部队在县城街道两旁休息，没有一个战士离开队伍，更没有一个战士走进群众家中。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纷纷把饼子、开水、稀饭送到解放军手里。

郭拴子决定投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一些进步人士如叶松龄、李冲等人的配合下，组织成立了石嘴山人民自卫队。解放军到达石嘴山后，人民自卫队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欢迎队伍有二三百人，男女老少，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拿黄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在街外风水洞处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军民同庆，场面热烈感人。“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等欢呼声此起彼伏。自卫队副大队长丁创业和民兵营长王景阳报告了石嘴山治安情形，谈了如何处理收缴国民党散兵枪支、马匹、军粮及子弹、汽油等情况，部队派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移交并接管。从此，581团就驻在了石嘴山。

人民解放军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解放了石嘴

山各县城。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一战线这个法宝在石嘴山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年，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进行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使得像李冲和、雍民飞等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迅速结在我党、我军周围，为欢迎解放军入境解放石嘴山作出了重大贡献。当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时，宁夏工委三段地负责人王茜(原名王振纲)就托人给石嘴山著名民主人士李冲和带去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李冲和的，希望他劝说郭永胜脱离马匪反动集团，投向人民方面来，免去宁夏人民作无谓的牺牲；另一封信是写给郭永胜的，指出当宁夏将要解放之时，应投向人民这一方面来，共同推翻马匪统治，解放宁夏，使宁夏70万黎民重见光明。李冲和接到信后，星夜骑马赶到黄渠桥，分别与进步民主人士刘堂琛、雍民飞等人商议，未找到万全之策。9月上旬，李冲和又到石山找叶松龄商议争取郭拴子的办法。叶松龄立刻想到当时在石嘴山开船摆渡的刘世英与郭拴子交往很深。次日，正巧郭拴子来到石嘴山，刘设宴款待，并晓以利害。经李冲和、叶松龄等人多方做工作，郭拴子终于同意投诚，并命人组织了自卫队，维护了解放前夕石嘴山一带的社会治安，避免了一场劫难，使石嘴山地区实现了和平解放。

其次，回汉人民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1932年马鸿逵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宁夏解放，统治长达17年之久。在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劳动人民一年辛苦到头，仅有一点收获也被掠夺精光，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群众中流传着“万物皆上税，唯有屁无捐”的民谣。而更令人不堪忍受的则是征兵，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在马鸿逵统治的17年当中，仅征兵就达16次之多。每次抓兵，都是棒打绳拴，全家老少跪地求饶也无济于事。有的壮丁不愿为马家父子卖命，就忍痛用石灰蚀瞎眼睛，用菜刀刺掉手指。他们为了稳定军心，还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胡说解放军抓了回民俘虏要杀头，共产党“共产共妻”。马鸿逵的血腥统治，致使宁夏回汉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有的因不堪忍受压榨而逃到了



解放前的平罗县城南北大街。(资料图片)

定边、盐池等解放区。宁夏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鸿逵恨之入骨。因此广大人民盼解放、盼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城的心情是急切的。当解放军来到石嘴山后，一些回民老激动地说：“解放军同志辛苦了，我们天天盼你们来，马家兵可把我们害苦了。”寥寥数语，道出了石嘴山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

最后，我党我军的政治宣传，对于赢得群众起了重大作用。1925年冯玉祥国民联军途经石嘴山、平罗，先进思想开始在石嘴山大地广泛传播，人民群众隐约感受到了一点新的气息。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先进思想的传播仍然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石嘴山人民对我党我军及其制定的方针、政策仍是知之甚少。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继续向宁夏进军。在解放宁夏各城镇的过程中，不断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告回民同胞书”“进入回民区注意事项”等，给群众一字一句地讲解我党我军政策。经过宣传，再加上群众亲眼目睹了解放军不扰民、守纪律、对劳动人民亲如一家的场面，使得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奴役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从存有戒心到逐步产生了好感，特别是那些苦大仇深的回民兄弟，终于看清了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解放军是他们的亲人。因此，解放军所到石嘴山各县，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群众对我军的反响是强烈的，他们主动为部队腾房子、烧开水，有的在路口搭起凉棚给指战员供开水，老大娘还给战士们送鸡蛋，硬往战士口袋里塞，场面相当感人。有许多战士说：“到石嘴山后，似有回到解放区之感。”

正是由于回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迎接解放军进城，才使得石嘴山各级政权顺利地移交到了共产党手中，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减少了损失；同时，也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欢迎，才使得部队的食宿问题得以很快解决，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扎根大西北。从此石嘴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里程。

(据《石嘴山往事》)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坐落着几孔土窑洞和石砌机房。抗战时期，这里曾是陕甘宁兵工厂的所在地。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兵工厂秉承“为前线服务、为战争服务、为边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它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组建了一支新型战斗集体，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茶坊兵工厂老照片。

百炼成钢，再建军工。1935年10月，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其中，原官田中央兵工厂108名兵工战士仅剩下7人，红四方面军归属到中央红军的70多名兵工战士，到陕北时也只剩下14人。这些经过战时生产和战斗考验的兵工战士，一边缅怀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一边同陕北兵工队伍会合，组建成新的兵工厂，为继续发展人民兵工事业投入新的战斗。

早期的兵工厂随军活动，流动性大，先后驻扎在延安柳树店、清涧、延川、吴起、延长等地，后迁回柳树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投入抗日作战，武器供应成为支撑作战关键问题。10月22日，为加强抗日武装建设，毛泽东致电在抗日前线的周恩来和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的内增加1万支步枪，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当时，恰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主人士涌向延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其中，以贺瑞林为首的近百名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以沈鸿为首的10名上海工人等，成为扩充红色兵工厂的生力军。尤其是沈鸿等带来的龙门刨、落地大车床、轻重大床等机器设备，使边区兵工厂的扩建如虎添翼。

服务作战，做大做强。1938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以下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兵工厂由延安柳树店迁至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也称茶坊兵工厂。初创时，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枪械修造部和机器制造部两部分，是一座既制造机器，又生产手榴弹、掷榴弹和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

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针，从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被分拆、整合，先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1939年5月，机器制造部改建为军工局一厂，主要负责制造子弹和手榴弹的专用设备，及打浆机、火药机和前线便携的小磨床、小铣床、小钻床等机械设备。1939年4月，原枪械修造部迁往郝家岔，组建为军工局二厂，在修理枪械的同时，开始试制生产步枪。1939年5月，在茶坊原枪械修造部旧址建立军工局三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后来发展成为专造迫击炮弹的兵工厂。1942年，在茶坊又建成紫芳沟化学厂，主要承担硝酸、硫酸、硝化棉、双基药等发射药和黑火药生产任务。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建成了一个小规模、部分原料自给、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初步具备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能力。

奋发自强，打破封锁。陕甘宁边区位于三省边缘，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落后，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基本由外地供应。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边区军民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陕甘宁边区各兵工厂的工人想方设法，创造性地完成军工生产任务。例如，在枪管上钻孔需要深孔钻床，工人们便在普通车床上装上一根长钻杆进行钻孔；没有拉来复线的设备，工人们就制造出手动拉线机进行拉线；没有铜料，就收集铜钱作为枪弹材料……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满足边区军民生产生活需要，军工局一厂在制造军工设备的同时，还大力制造民用机器，为边区经济提供成套设备。一厂先后自行设计、制造400台(件)民用机器设备，帮助边区建成火柴厂、肥皂厂、造纸厂、制药厂、皮革厂、纺纱厂、织布厂、印刷厂等，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8年至1945年，军工局一厂累计生产军工和民用机器设备134种，近千台(套)；试制出六零掷弹筒弹300多发，为边区的工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奋斗过程中，陕甘宁兵工厂涌现出“边区工人一面旗帜”“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他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从原陕甘宁边区农具厂(1938年改制并入军工局一厂)工人干起，以厂为家、加班加点，自愿从事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在1939年至1941年间劳动竞赛中连续获得“甲等劳动英雄”奖章。他轻伤不下生产线，一心一意钻研技术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例如，他曾建议用大飞轮带动的鼓风机代替人力拉的大风箱，后来又改为用汽车发动机烧木炭来带动鼓风机，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大问题。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兵工厂、政领导工会总结和宣传了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并掀起向赵占魁学习的群众运动。之后，在党中央的宣传与号召下，“赵占魁运动”又推广到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展成持续7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对敌作战，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实施战略大转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1947年3月开始，军工局一厂、紫芳沟化学厂、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等陕甘宁边区兵工厂，东渡黄河并入晋绥兵工厂，继续为解放战争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

(据《中国国防报》)

陕甘宁兵工厂：黄土高坡铸锋芒